

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九辑

三秦出版社

杜文玉◎主编

唐史論叢

第九輯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唐史论丛(第9辑)/杜文玉主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7. 1

ISBN 7 - 80736 - 131 - X

I. 唐... II. 杜... III. 史评—中国—唐代—丛刊
IV. K24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292 号

唐 史 论 丛 (第九辑)

杜文玉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36 - 131 - X/K · 81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韩愈与长安——9世纪的转型	(日)妹尾达彦/1
武则天与太子李弘、李贤的关系考释	赵文润/29
隋唐五代时期的尉迟氏	余 静/41
汉唐监察制度的变革	胡沧泽/57
论唐代的州县“摄”官	(台)赖瑞和/66
从刺史的地位看唐代内外官的轻重	夏 炎/87
唐代官方美术教育机构的递嬗及其影响	黄 燕/105
试论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	于赓哲/121
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	陈国灿/137
试论唐代马匹在丝路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	乜小红/152
龟兹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驻屯史迹	张 平/171
《三国遗事》所见罗唐关系关联内容的新考察	拜根兴/198
隋唐时期登州港的历史地位浅析	朱 龙/217
唐何进滔德政碑侧部分题名释录	孙继民/232
唐徐峤墓志与徐峤妻王琳墓志初探	赵振华/239
晚唐《春宫颢娘墓志石》小札——兼读晚唐相关墓志 小品及其他	王其祎/253
唐秦王李茂贞之妻刘氏墓志考释	王凤翔/259
自然灾害与唐代农业危机	李 军/270
五代十国时期茶法考述	杜文玉 王 蕾/286
唐代的双陆与握槊、长行考辨	王永平/297
汉译佛典与杜诗语汇	何红艳/312
中古道教的“中国”观念	刘 屹/322

从《太平广记》中的仙女下凡故事看唐代的道教观念

..... 焦 杰 戴绿红 雷巧玲/335

南唐与前后蜀文化的比较研究 王丽梅/347

CONTENTS

Han Yu and Chang An——Transition in the 9th century	Seo Tatsuhiko/1
An Investigative Argu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 Zetian and Crown prince Li Hong, Li Xian	Zhao Wenrun/29
The Yuchi Clan in the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Yu Jing/41
The Change of the Supervisory System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y	Hu Cangze/57
The “Acting” Officials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under the Tang Dynasty	Lai Swee Fo/66
A Study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s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Position of Prefectural Governor	Xia Yan/87
About the Change in Succession and Effects of Art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Huang Yan/105
A Research on the Limit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Yu Gengzhe/121
Xizhou’s Position and Function on the Silk Road in th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Chen Guocan/137
On the Horse’s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Nie Xiaohong/152
About the Important Traces of the Garrison and Troops Growing Food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Qiuci	Zhang Ping/171

The New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Relationship of the Xinluo and Tang Dynasty from the Book of SanGuo YiShi	Bai Genxing/198
Talk about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Harbour Dengzhou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u Long/217
An Investigative Review of Some Names Signing on the Side of Tablet of He Jintao in the Tang Dynasty	Sun Jimin/232
A Research on Xu Qiao and His Wife Wang Lin's Epitaph of the Tang Dynasty	Zhao Zhenhua/239
About the Epitaph of a Maid in Crown Prince's Palace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Reading Relevant Epitaphs and Others in the Late Tang Concurrently	Wang Qiyi/253
An Investigative Review of the Epitaph of QinWang Li Maozhen's Wife Liu Shi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Fengxiang/259
Natural Calamity and Agricultural Crisis in the Tang Dynasty	Li Jun/270
An Investigative Review of the Law of Tea in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Du Wenyu, Wang Lei/286
An Investigative Argument on the ShuangLu and WoShuo, ChangXing of the Tang Dynasty	Wang Yongping/297
Buddhism Book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Vocabulary in Du's Poems	He Hongyan/312
The Idea of "China" in the Taoism of the Medieval Time of China	Liu Yi/322
Seeing the Idea of Taoism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Stories of the Fairy Maiden Reaching the Mortal World in the Book of TaiPingGuangJi	Jiao Jie, Dai Lüthong, Lei Qiaoling/335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Between the South Tang and the Former - latter Shu State	Wang Limei/347

韩愈与长安

——9 世纪的转型

妹尾达彦

序

最近数年有关唐宋变迁的研讨会、研究会在世界各地相继召开,这说明反思唐宋变迁时机已跨地域成熟起来。在研讨会、研究会纷纷召开同时,有关唐宋变迁研究动向的整理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①。仅以本人阅读到的论著而言,在这 10 年间,有中砂明德^②、Peter K. Bol(包弼德)^③、青木敦^④、邱添生^⑤、葛兆光^⑥、丸桥充拓^⑦、P. J. Smith^⑧、山根直生^⑨、中岛乐章^⑩、张广达^⑪等人从不同观点整理了有关唐宋变迁的研究状况。如此众多才华横溢、异彩纷呈的论者围绕唐宋变迁研究进行研究整理之盛况,在整个学界也蔚为壮观。

近年来,牵涉到唐宋间变迁论题的研究如此兴盛,其理由之一是唐宋变迁这一研究题目起到了将各专业领域开展的个别研究联系起来的作用。而更根本的是因为在迎来 21 世纪之际,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与提出唐宋变迁这一假说时的近代国家形成期不同,新的世界局势要求不同以往的世界史理解。也就是说,经过唐宋间的变迁诞生了与近代直接相关的社会这一思考如今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在向后现代过渡的目前,回顾逝去的近代社会的胎动期,追问近代社会本身之意义在世界各地的时机同时成熟起来。

本文在这些近年有关唐宋变迁的议论的基础上,选择长安城市史与韩愈精神史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案进行分析,以尝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史中的 9 世纪之转型的意义。关于唐后期知识分子的

思想与都城长安城的城市社会的动态之关系,已经有陈弱水氏的柳宗元研究^⑩及川合康三氏的白居易研究^⑪等的成果。笔者也曾分析过白居易与长安及洛阳的关系^⑫。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分析韩愈思想与长安社会史的密切关系。

长安是象征着当时政治社会史转型的都城,从8世纪末至9世纪前半期,生活在长安的韩愈(778—824年)是体现了时代转型的知识分子之一,同时也是开辟了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新时代潮流的先驱。

关于韩愈的作用,自陈寅恪《论韩愈》(1954年)以来已有为数众多的研究积累^⑬。在本文中根据已发表的拙作《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11,2005年)与《“才子”与“佳人”——9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唐宋女性与社会(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长安の忧愁——9世纪の转换》(《アジア游学》78,东京:勉诚社,2005年)中的考察,试图对9世纪长安城市史与韩愈精神史的密切关联进行新的探讨。本文是在上述《长安の忧愁——9世纪の转换》的基础上,并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增补而成的。

一、对动物的视线变化

芝加哥大学,1961年12月17日,一个冬日。穿越密西根湖的湖面,来自加拿大的刺骨北风吹拂着整个芝加哥城。秋季学期即将结束,芝加哥大学神学部宗教学科教授 Mirecea Eliade(1907—1986年)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随手翻阅着学生提交的关于神话讲义的期末小论文。

这时,一名专攻中国学的学生以9世纪中国大陆南端举行的有趣的宗教仪式的记录为题材所写的一篇小论文引起他的注意。

那是赴任来到中国大陆南端的潮州这一城市的地方长官(刺史)写给祸害居民的鳄鱼们的题为《致鳄鱼书》的奇妙文本之翻译

与注释。地方长官名为韩愈(778—824年)。该学生的小论文内容是对欧亚大陆的宗教现象进行系统性比较分析,令 Eliade 的内心感到振奋^⑥。

韩愈的《致鳄鱼书》是这样开头的(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鳄鱼文》,上海古籍出版社,573页):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韩愈因批评皇帝崇佛,被从长安贬职到偏远的潮州,此时在面向南海、贯穿潮州的韩江入海口,鳄鱼繁殖,吞食两岸民家的家畜,祸害居民。于是韩愈派遣手下来到鳄鱼生息的河边,向鳄鱼投放了一只羊和一口猪,然后对着鳄鱼念起了劝止其祸害人们的《致鳄鱼书》。

韩愈向鳄鱼们宣读的内容如下(同上书,574—575页):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擗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睥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忸忸覼覼,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

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据《旧唐书》与《新唐书》韩愈传，韩愈所写的致鳄鱼的书信惊动了天地。宣读书信当夜，电闪雷鸣，河中起了暴风，数日间河水全部干涸，最后河道移到西部约 30 公里处，鳄鱼也从居民们居住的区域消失了^⑦。

韩愈此《鳄鱼文》与《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论淮西事宜状》等著名文章一起收录在《旧唐书》与《新唐书》韩愈传中，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五代至北宋时期代表韩愈一生的重要文章之一。然而如今比起《进学解》、《论佛骨表》等文章，在韩愈的文章中，《鳄鱼文》几乎被人遗忘了。

Eliade 是如此解释上述韩愈的文章的。他认为在此文中真皇帝出现在世界上，为允许鳄鱼繁殖的无政府状况及混乱的时代打上句号，主张以新的“宇宙 cosmos”取代此前的混沌局势^⑧。也就是说 Eliade 将韩愈的文章定位于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宣告混沌终结的宇宙创生、再生故事之一。

Eliade 的这一解释将 9 世纪韩愈的思考特征作为前近代世界的普遍认识之一例来考虑，这一点极具魅力，也有说服力。当时 50 过半的 Eliade，开始集 30 多年工作之大成，系统整理贯穿世界宗教现象的诸原理，试图复原近代消失了的前近代的人们具有的整体知性，复原人类在可与自然及神灵交感的时期，运用五感而获得的深层知性。

的确，韩愈的这篇文章中出现的现代社会中业已丧失的，有关人与动物、自然的多元认识宛如宝石箱中镶嵌着的晶莹宝石。它们具有令在欧亚大陆比较宗教史研究领域不断进取的 Eliade 为之心仪的魅力也是令人信服的。

不过为了理解此《致鳄鱼书》，虽然需要像 Eliade 那样将其还原为宗教现象的普遍原理来分析，明确影响 9 世纪中国大陆的男性知识分子的该时期固有的问题之所在，但只有同时将这一时期、

场所、性、状况所特有的重要因素与超越时空的普遍性重要因素相互对照,才能更好地弄清韩愈此文的含义。

顺便指出,韩愈文章中出现的鳄鱼被认为是鳄亚科的湾鳄(*Crocodyles porosus*)^⑨。湾鳄与尼罗鳄一起以生活在亚洲热带的最凶猛的鳄鱼而闻名。大的湾鳄体长6—7米,体重超过1吨,栖息在入海口或海湾,可游入大海。在水中等待猎物,靠近水边的家畜与动物,有时包括人可能被它以长有锐利牙齿的下颚咬住,硬拖入水中吞食。

在爬行动物中身躯最大的鳄鱼在很长时期内是令人恐惧的,同时也作为超越人类力量的动物受到人类的崇拜。这从韩愈向鳄鱼们供上一只羊、一口猪这一行为中也可以看出。

唐代以前,从潮州附近至海南岛的地域中栖息着众多的湾鳄。比韩愈年轻9岁的李德裕(787—849年)于9世纪中叶,由宰相被贬职为潮州地方官,在赴任途中也遇到了潮州的湾鳄(鳄鱼)。李德裕乘坐的船只在鳄鱼出没的潮州周边河滩出了事故,从长安带来的珍贵的古书图画沉入了水底。想要打捞上来,也因鳄鱼极多而束手无策(《岭表录异》卷下,丛书集成新编9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18页。又参看《太平广记》卷四六四《鳄鱼》,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3820—3821页)。原文如下: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鼉,而举止趑
疾,口森铍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
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
之相摄伏也。故李太尉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
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船上昆仑取
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窟宅也。

然而宋代以后,中国南部的湾鳄遭到人类有组织的捕杀。北宋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中描写了闽中采用的在猪中放入鱼钩,沉入水中来捕捉咬钩的鳄鱼的方法。那时进入了人类主动大量捕捉鳄鱼的时代(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卷二一,异事,705页,381条)。原文如下: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予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龟，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铍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鼃鼃、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鱼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于是湾鳄在14世纪，即明朝初期，先在潮州附近绝灭，20世纪初在海南岛附近也绝灭了^⑧。以前湾鳄广泛生息在从中国南部至东南亚、印度洋的地区，如今主要的生息地域缩小为印度南部至澳大利亚北部的沿海部等少数地区。

从鳄鱼的角度来看，韩愈的《鳄鱼文》象征着它们与人类的关系进入了磨难时代。换言之，也可以认为韩愈的文章说明韩愈生存的8世纪后半至9世纪前半期，随着对未开拓地的不断开发，中国大陆的人与动物、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化了。

虽然应该避免轻率的结论，但我们仍可以认为在中国大陆，由于开发的进展与技术改良的互相推动，进入9世纪后，以往人类与自然界、超自然界未分化的状态开始向人类从自然界、超自然界中独立、分化出来的时期过渡。带着在唐朝首都培育出的最新价值观，决心与凶猛的鳄鱼战斗下去，使之屈服的韩愈的姿态正是体现了该认识之变化的一个事例。可以认为韩愈是敏锐地感觉时代的变化，推动其发展，使之加速的人物之一。

要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状况进行更加具体探讨，其线索则存在于819年贬职到潮州前，韩愈生活的9世纪前半期的长安城街东的中部，闲静的宅第街区的情景之中。

二、遇刺的宰相——长安街东的中部空间

长安靖安坊，815年（元和十年）6月3日，凌晨3时半左右。

城内还笼罩在夜色之中，在靖安坊拥有宅第的宰相武元衡

(758—815 年)因赴大明宫上朝走出家门。按照规定去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须在凌晨 4 时左右进入大明宫建福门。从武元衡宅第到大明宫建福门不到 6 公里,骑马约 30 分钟的距离。比起北风呼啸的隆冬早朝之苦,6 月拂晓的夏季凉风倒为上朝增添了些许心情上的快乐。

武元衡借着随从秉烛之光,穿过靖安坊东门,步出自启夏门至兴安门南北延伸的大街那一瞬间,埋伏在街道旁树荫下的刺客突然猛扑过来,将武元衡残杀,鲜血四溅,刺客在血雨中拎着割下的头颅,匆忙逃去。武元衡享年 58 岁。

同日,居住在靖安坊北侧之坊永乐坊里的政府高官裴度(765—839 年)也在上朝途中,与武元衡遇刺几乎同一时刻被人袭击。裴度被刺客所砍,滚落到大街旁沟中,头颈负伤,多亏戴着厚厚的毡帽,捡到一条性命。

这一大早袭击中央高官,正是地方军阀向长安派出的刺客所为。地方军阀试图通过暗杀推进中央政府集权化,对军阀实行高压政策的中央政要武元衡与裴度,来逼迫中央政府改弦易辙^②。

当时这一袭击事件震惊了赴大明宫上朝的住在街东中部的官员们。这一地区由于远离警备森严的宫城与皇城周边,原来在治安上就不甚安全。从街东中部到大明宫更有五六公里距离,上朝退朝时间长、距离远,因而官员在上朝途中受强盗袭击的危险就更大。

武元衡与裴度宅第所在的街东中部是从 8 世纪末到 9 世纪前半开始开发,逐步成为城内新宅第街区的地域。远离大明宫的这一地域因官员住宅区不断扩大,结果一到拂晓,街东中部到大明宫门的路上,昏暗中赴大明宫上朝的官员们的随从们手执的烛光宛如悬浮在夜空中的星座,延伸出一条白光^③。

虽然到大明宫骑马也要 30 分钟左右距离,但很多官员住在街东中部。主要原因是在 9 世纪初叶,大明宫前便利的地区都由皇族、宦官和一部分政府高官的宅第、政府设施以及宗教建筑等所占,那里成为城内最高级的住宅区,一般官员新购入房产的话,土

地价格过高,是新人较难介入的场所。

而街东中部与大明宫前诸坊相比,虽然居住环境略为逊色,但在土地价格、自然环境之优美、交通方便等方面有其优点。特别是对金榜题名、前途无量的青年官僚们来说,这里成了实现在长安城内拥有自己宅第这一多年梦想的最佳地点^⑧。

隋唐初期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以大明宫的建设为契机开始受到破坏,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6年)以后,为了便于上朝,官员们开始集中居住于大明宫前面的街东部,于是当时的商业发展和城内的居住环境发生联动,出现了种种变化。以东市为中心的地区,集中了高级商店、酒家、游廊、旅馆等,成为当时城内的一等地区。而街西则成为中下级官员和商人及一般庶民集中居住的区域^⑨。

到了8世纪末至9世纪前叶的中唐时期,近邻大明宫的街东北部,由于亲王、宦官、高官的集中居住而地价上升,官员的居住地,出现了向比较起东市周边的诸坊相对地价便宜的街东中南部的高地——乐游园北侧斜面逐渐扩大的倾向。韩愈、柳宗元及白居易等中唐著名文人的居住地集中在街东的中南部,是在9世纪前半叶官员宅第渐渐扩大的新兴住宅街的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街东南部的环境也日趋完善,连接曲江池、杏园、菩提寺一带逐渐成为城中的风致地区,长安城城南的景胜地区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尽管距离大明宫较远,而位于高地,环境闲静,近控行乐之地的街东中南部的价值开始上升,高官府第鳞次栉比。并且随着街东中南部成为官员的居住地,其作为官人同僚之间的交流场所的作用也凸现了出来。对韩愈而言,广布于街东中南部的友人的府第,以及街东南部的行乐场所,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⑩。

《长安官人居住分布》标示了安史之乱(755—763年)后至文宗即位(826年)约80年间官人的居住地。是在宋敏求《长安志》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及近年来补正《唐两京城坊考》的诸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上新出墓志等新信息而图式化的^⑪。

由此可见8世纪后半至9世纪前半这一时期街东中部出现了

官人住宅聚集的倾向。只不过图示了这一时期居住的官员的极少一部分。反映的居住分布倾向可通过其他多种文献数据来确认，可以认为它反映了一般倾向^②。

住在街东中部的官人们，因生活在同一地区，互相交流密切，日常出入同僚的宅第，加深交情，而科举合格的优秀官僚们之间的亲密交流本身又抬高了这一地区的价值。要新加入这一地区的圈子中，科举合格之资格必不可缺，因此对科举考生而言，中举，然后在此地购置产业，进入精英圈子就成为他们具体的目标^③。

在中国，作为高等文官试验制度的科举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叶在社会上生根，高官的大半为科举出身者所占。不凭借出身贵贱，而根据科举合格这一业绩构成知识精英阶层的制度由此起步。如今21世纪，不依身份而靠“业绩”来决定阶层的社会制度已经普及到世界上所有角落，由此可认为9世纪在中国大陆的都城出现的此制度，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转机。

科举制度在中国得以作为政治制度确立的时期，正是安史之乱(755—763年)后8世纪末到9世纪之间的时期。科举制度本身始于6世纪的隋代，在唐前期的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作为制度逐步确立。但是，科举出身的中央政府的枢要官占到总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社会阶层的构成原理从重视出身身份(属性)转换为重视科举考试的成绩(业绩)，是在9世纪以后的事了。

由于这种科举的业绩考试，科举合格者们开始摆脱贵族与非贵族的从前属性，构筑了可称之为科举合格者阶层的新的阶层。尤其是同年度的科举合格者们，共有了超越出生地、门第出身、官衔(官职、官品)的永存一生的强烈连带意识。总之，同年度合格者们彼此称呼为“同年”、“同年友”的同辈意识，在科举未定型的7世纪尚未存在，其确立于8世纪中叶至9世纪前半叶，存续至科举被废止的清末，创出了超越血缘与地缘的新的人际关系。同年合格者在共度合格后举行的各种通行礼仪当中，彼此产生了坚韧的连带感。他们在科举考试之后也频繁聚会，加深交往(“同年会”)；宋代以后，发行了记有同年科举合格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履历的册

子(“同年录”),致力于人际关系的保持,并时常在政界形成了政治党派。

如此看来,合格科举的业绩,等于一种“爵位”,变为支配此后一生的一种属性(区别于原来的属性,称为业绩主义属性)。科举合格者获得的业绩主义属性可以永持一生,从而诱导了其在政界的晋升、婚姻及人际关系的有利发展。因此,为了获得这种属性,科考竞争变得越加炽烈。9世纪,虽是少数,非门阀的科举合格者可以与从前不可能缔结婚姻的门阀出身的小姐结婚了。这也反映出科举合格者们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⑧。

就在韩愈因《论佛骨表》批评宪宗的崇佛教热情,触犯龙颜,819年被左迁到远离都城长安的南方潮州前,与被暗杀的武元衡在同一时期居住在同一靖安坊。在靖安坊里,除了韩愈(768—824年)、武元衡(758—815年)外,还居住着元稹(779—831年)、张籍(768?—830年)、刘禹锡(772—842年)、柳宗元(773—819年)及裴度(764—839年)等代表中唐的科举文人。

武元衡遇刺的815年,韩愈48岁,当上了考功郎中(从五品上)、知制诰(担任别的官职同时参与起草诏书的一种官职),位居要职。对于此暗杀宰相事件,韩愈义愤填膺,立刻写下了催促逮捕犯人的上表文^⑨。

侥幸逃生的裴度被任命接替武元衡为宰相(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知制诰韩愈也为裴度代笔写了辞让宰相之职的上表文《为裴相公让官表》^⑩。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上表,事件发生的22日后的6月25日,裴度就任宰相后,遂站在了指挥讨伐密谋暗杀事件的反中央的地方军阀战斗的最前线。

韩愈怀着立足于街东靖安坊的宅第,以自己的能力来开辟新时代的自信和因中举而孕育出的强烈的自负,享受着城市中的生活。这样的心情是当时青年科举官僚们共同具有的。

韩愈的诗文中也洋溢着这样的豪情。对鳄鱼的示教、向皇帝的上表、对子孙的训辞(下述),尽管对象不同,但都自始至终充满着世界因自己的主体意志而运动,以自己的主体意志来推动世界